

作为“雄辩员”“总编辑”与 “委员长”的胡风

——以新见《东南大学附中周刊》为中心

吴宝林

内容提要 学界对“左联”之前胡风的诸多史实和文学思想关注较少。新见《东南大学附中周刊》从三个面向体现了胡风在南京时代的文学与社会政治活动：辩论会上的“雄辩员”，校刊的“总编辑”，以及“五卅”时作为“反抗上海外人惨杀华人东大附中后援会”的“委员长”。同时，该刊物上有胡风多篇佚作，有助于从诗学角度构造连续性的历史脉络。对青年胡风来说，当“五卅”和国民革命等“外部的政治”开始褪色后，从“文学的内面”去启发根本的政治，逐渐成为其后来的核心追求。

关键词 胡风；文学青年；诗学；《东南大学附中周刊》

胡风研究的材源相对集中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学界对胡风在国民革命前后的文学思想与政治活动关注较少。第一手史料匮乏虽是主因，但对胡风诗学理论生成、发展与实践的历史脉络缺少连续性的体认和整体结构感，或许才是深层原因。毕竟史料是随着问题意识而浮现和凸显其助益之处的。

早在1934年初，胡风接到好友朱企霞主编的《华北日报》副刊《每周文艺》，在第8期上读到俞平伯的散文《古槐梦遇》后感慨道，“平伯君底文章使我叫了几声‘阿弥陀佛’”，由此促使其创作了《理想主义者时代的回忆》^[1]。该文以留日时期作为镜像，以描写“心境”的抽象方式批判性地回顾了自己的青年时代。这是胡风经由“日本体验”而使文学观念、语言风格与人事交游等各方面发生复杂转变后所写的文章^[2]，亦是了解胡风进入“左翼”后思想状况的核心文本^[3]。然而较易被忽视的是，此乃胡风在特定时刻的“自我叙事”。作为研究前史，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许多研究具有为胡风恢复名誉的潜在意识，是一种“复权”过程。因而现实、政治、历史、理论等相互交涉缠绕，

构成了相当复杂的扭结状态。本文则跳脱出上述意识形态和文学史困境，以新见的第一手史料《东南大学附中周刊》（以下简称《附中周刊》）为聚焦中心^[4]，从历史真实和诗学理论生成两个层面，描绘和勾勒具有连续性的文学史图景，以图打开新的讨论空间。

在进入论述前，有必要先介绍东大附中及其周刊。胡风是1923年9月至1925年夏天就读于东大附中高中部。该校在20世纪20年代颇具革新精神，尤其在国文教学上有不少创制，如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高级国文部分即是胡风的国文教师穆济波起草。作为校刊，《附中周刊》（每期一般8页，少数是16页）不仅登载教学情况，还主要刊登师生作品，如“对于时局的分析”，“创作或翻译的各种小说，诗歌，戏剧”^[5]。此外，还发表校外名人来校的讲演记录稿^[6]。该刊不少作者后来成为有名的学者和革命者，如陈梦家、卢冀野、顾作霖、孙俚工等。因此，在沟通学校小环境与时代关系上，该刊可以说是一个综合刊物。当时代风潮兴起时，这一点就表现得更显著。

一 “雄辩员”与“强 Energy”

相对于国民革命的“狂潮”和北京时期的“灰色”，胡风对南京时代的回忆是一种温暖的色调。正是在此时期，胡风“更关切地触到了社会”，“对于文学的气息也更加敏感更加迷恋”，阅读了两本将其“淹没了”的书，即“托尔斯太底《复活》和厨川白村底《苦闷的象征》”^[7]。这两者的并置也象征性地揭示了其诗学理论中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双向展开的可能性。在南京时代，“外部的政治”与“文学的内面”也开始作为对位结构而出现。虽然此时胡风还处在“观念论的艺术观”的统摄之下^[8]，文学与政治的“往复”还较为单向和平面，但这一结构却具有深远影响，经过日本时期的淬炼之后，产生了较强的生产性与延展性。

20世纪20年代初期，新文学作为一项教学机制进入到各级学校的课堂中。“辩论”、“演说”、“作文”和“谈话”等方式被视作与新文学密切相关的教授法。早在1920年3月，胡适在《中学国文的教授》中就提出了一个“理想标准”，第一条就是“人人能用国语（白话）自由发表思想——作文、演说、谈话——都能明白通畅，没有文法上的错误”，而且专门讲述了“演说与辩论”的益处和方法^[9]。1927年2月，鲁迅在香港发表演说“无声的中国”，试图在国民革命进行时接续“文学革命”的脉络，且将“古文写作”等同于声音的“零”。而与此“零度的声音”相对的并非作为书写形式的“白话文”，而是意味着“活着的白话”，须“感情直白地说出来”。“声”之有无，对应的是主体的深浅和真伪：“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10]对“真心的话”的强调，与青年对国民革命的向往和想象存在着某种共鸣的结构。在“感情直白”的“说话”与“革命”之间可以生发出一种文学意义上的联系。胡风对“声”之“真”的追求与表达，在经历了国民革命与留日体验之后，其所欲之“声音”与所求之“行动”，相较鲁迅所言的“真心的话”更为激进和激越：

中国到现在为止没有过写实主义，不用说，

更没有过浪漫主义。需要从丹田叫出来的真的叫喊。^[11]

如此决断之语，与其后来同时对“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执意批判也有着莫大关系。在根本上，“真的叫喊”显露出对别一种文学的期待。因为“丹田”之“真的叫喊”，不仅需要“力”的支撑和一种“进击”的态势，更需要“全身筋肉底总动员”^[12]。

如果把时间轴“往复”到胡风在东大附中期间，这种需要“全身筋肉底总动员”的“思想”与“真的叫喊”，就可以找寻到其兴起之源。在民国时期的江苏教育界，“雄辩”曾受到过特别关注，各级学校经常举办跨校的“联合演说竞进会”^[13]。事实上，“雄辩”和“演说”经验对胡风诗学理论与文体的塑造构成潜在影响。“雄辩”对“声音”的强调，与胡风在政治实践、文学组织活动中的作风也有微妙的关系。而胡风在东大附中作为“雄辩员”的经历则“有史可查”，证据即是《附中周刊》的一篇题为《雄辩健将初试舌锋》（1924年4月22日）的报告：

（按：略引）此次南京各校联合辩论会参与团体计高等组四校、中学组七校，其辩论题目高等组为《俄最近草案我们应否签字》

兹将各级组推出的雄辩员姓氏录下

高一——王治安 陈同庆 陈朝华 蒋豪 张光人 徐文博^[14]

这则通告是东大附中教师杨效春所写。有意味的是，这些“雄辩员”日后都活跃于“五卅运动”中。杨效春在通告中称：“之数人者本各以雄辩著于校及今将各尽其能竭其智运用舌锋以交绥矣胜负正未可卜也。”经过各级推举出来的“雄辩员”名单，显然具有代表性，他们素以“雄辩”著称于校，胡风更不例外。此次雄辩会属于校内预赛，最终获胜的是胡风同学王治安等人，且王还代表学校获得当年“联合演说竞进会”的冠军。东大及其附中对“演说”与“雄辩”甚为重视，即使在1925年东大“易长风潮”波及中学部、廖世承主任宣言要离职时，学校负责人最后还不忘提醒学生：“演说竞进会，各级应推举代表，现在已选出否，望各注意！”^[15]

雄辩会的具体形式和评判标准校内外有所不

同，江苏演说竞进会并不区分“雄辩”与“演说”，胡风等人在预赛时参加的是“雄辩”，在决赛则是个人限时“演说”^[16]。从“雄辩”到“演说”，也是从“对话”到“独白”，形式有所差异，但都对口头叙事和表达能力有很高要求。虽然在“雄辩会”中失利，但比赛结果似乎并没有影响到胡风。几天后，胡风就写了题为《是非与利害——论现代青年根本态度之一》的“雄论”。从内容看，也很像是“雄辩”的语体，且不时有辩论所需要的“精到之语”（口号式提炼）：

一、于个人无利无害而居于是的，我们要做！

二、于个人有利而居于是的，我们要做！

三、于个人无利无害而非的，我们不做！

四、于个人有害而非的，我们不做！^[17]

胡风对“是非”与“厉害”的区分，实际上处在当时的少年中国学会（以下简称少中会）同人关注青年“人格修养”问题的延长线上。1923—1925年，少中会的骨干成员几乎都在东大及附中做过演说。1923年10月，少中会提出“求中华民族独立，到青年中间去”的纲领，胡风也恰在同一时期来到南京。而穆济波、李儒勉与杨效春等都是少中会成员^[18]。

预赛结束一个月后，胡风替杨效春写了《现在的青年何以不喜欢团结——答刘巍君》一文：“从前的儒者遇着乱世尽可以赋‘归去来兮’，我们现在却万丢不掉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光顾自己是不行的，就是把‘将来’标榜起来也是不行的，最好是即时团结起来担负你的责任！我们现在无论从社会生活方面看，从个人修养方面看，团结总是我们生活的一部。”该文不少说法与少中会理念一致，如反对“教育救国”、鼓励学生走出“象牙塔”：“青年都希望他将来成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是倘若你问他怎样达到这个目的，他总相信现在把功课做好，将来到社会上去一定能如愿以偿。”^[19]对“功课主义”和局限于“象牙塔”的批评，也是胡风的身份认同。在此时期，不断积聚的对学校教育的不满，向往因阅读新文学而激发出的“没有注释的‘光明’”^[20]，终将胡风等人推向了国民革命的“狂潮”之中，使这一代文学青年经受了与时代共振的人生

第一次巨大的颠簸起伏和巨浪冲击。

而与“雄辩”相应，胡风认为：“青年，我愿你‘自我爆发’，但我更愿你记得‘合力大于分力’的道理。”^[21]胡风使用“自我爆发”这种语词令人联想到他后来所使用的“自我扩张”等具有“强Energy”的概念。穆木天在《郭沫若的诗歌》中说：“《女神》时代的他的那些诗歌，就是自我爆发的诗歌，这种强的Energy的诗歌，（中略）同样地反映着那种爆发性的自我表现的要求。”^[22]与“强Energy”相似，胡风后来使用“突击”“突入”“合抱”等概念描述主体进入客体对象所必须的“战斗”行为。比如德国作家苏德曼的《忧愁夫人》让胡风印象深刻：“用了农民底原生的韧力忍受着生活上的一切磨折。”^[23]“农民底原生的韧力”不正是抗战时期胡风、路翎强调与表现的“农民的原始强力”吗？强力也即“强Energy”。这种“强Energy”的“进击”态势标识了胡风诗学理论的能动性和创造的可能性。

“强Energy”还与胡风此时蔑视权威有关：“大批评家不敢动笔创作恐怕是这个道理，大作家功成名遂以后就不能再发展，恐怕也是这个道理。至于我们，应该唾他们一脸唾液，而dash（急奔，猛冲）前去！”^[24]这种“dash”自然需要“强Energy”。当政治风潮达至顶端时，这种主体必然会被时代情绪所捕获，将“新文学”中的情感结构想象性地赋予革命实践。那些“灵魂的深与宇宙的广”的文学使主体产生“生命似乎要停滞一样，宇宙绕着我，一时变小，一时变大”的激进主观^[25]。然而，正是这种“强Energy”的激进主观构造了“理想主义者”的基本结构，甚至也构成了“理想主义者时代”的基本要素。

与此同时，“强Energy”的主体状态也能导引至一种“强Energy”的社会责任感。胡风的国文老师穆济波曾编选高级国语读本，目的“在能使学者在读书生活中了解现代国家大势，以长养其爱国忧时坚贞自励之良习”。全书共29篇，包括李石岑《青年与我》、左舜生《中国青年与“现代研究”》、萧楚女《诗的生活与方程式的生活》、郭沫若《力的追求者》等，其意义在“表现现代青年之使命，及纠正其遗弃现实之非”，“引导青年研究现代，

根据史实，追求社会病象之总原因”等。选文旨趣则包括“意志力的锻炼”，“从普遍的训练继而为现代人生的要求”等^[26]。而“团结”就与这种社会责任感有关。在分析青年为何不喜欢团结时，胡风认为是“缺少了团结的习惯和训练”，这是“一向没有团体生活的人”的难点，如“偷懒”、“对于别人太求全责备”、“守不惯规律”和“不能牺牲”。“一句话：我们目的手段大致相同而无冲突的，就可以团结”，所以胡风认为“现在所要讨论的，不是应不应该团结的问题，而是怎样才能团结的问题，怎样才能使我们团结能够扩大的问题”^[27]。同样，穆济波也提醒要“注意青年团体的团结，与共同生活应有的知识与修养”^[28]。可见这同属一个脉络。而“团结”的问题，也是环绕胡风历史命运及身后评价的关键词。

二 “总编辑”的意志与以笔名布阵

除“雄辩员”外，胡风还担任过《附中周刊》的“总编辑”，任职时间从1924年9月至1925年1月左右。《附中周刊》总编辑施行轮流制，栏目编辑由学生自治会成员分任，其中“来稿要求附作者真实姓名，但发表时可以用笔名”^[29]。胡风所编刊数从1924年10月17日第33期至1924年12月19日第42期，中间还有一期是“郊聚特刊”，因此共11期。但现存文献中缺少第33—36期（该刊第1—19期也皆缺）。从这些幸存史料中，我们可以把握胡风作为“总编辑”的文学活动，尤其在周刊其他几任“总编辑”的对照中，更能看出其“编辑”特征和“权力意志”。极具象征意味的是，《附中周刊》上曾有胡风作为“雄辩员”与“总编辑”同时出现的历史画面。在第37期的“编辑室”栏目中，有署名刘毅孙（上一任的总编辑之一）的《一个声明》：

本学期周刊编辑方法，采用分任制，每栏都有负责编辑的人。毅孙是记事栏的编辑，对于其他稿件，本不容有置喙余地；上次和张君光人辩论，是毅孙口快的原故，我对于上次的侵犯他人权限很抱歉，我很对不起总编辑张君和主编文艺的柳君杞生（按：柳杞生），那里

还敢受领“负责”两字呢？

末了我还要说一句，就是张君和我的感情，并不因此次的辩论而变疏，反觉得浓厚了许多，这是我应该向大家宣布，而同时可以减少我罪过的。

胡风所编《附中周刊》正好缺了几期，因此“其他稿件”具体指什么已不得而知。不过，从中可以鲜明地感受到胡风对自己所编稿件的自信与坚持，也可知“总编辑”的权限也是相对较大和独立的。在胡风当“总编辑”时，作者多用笔名，今天已很难辨识真实姓名。而在其他几任总编辑任期中的《附中周刊》，作者姓名基本上是真名或字号。这种大量采用笔名或化的方式应是胡风有意为之，是一种战斗的“布阵”手法。

譬如第37期言论栏有济波的《非我心目中的江南同学》和署名莹的《所谓“学者”的心目中之中国》。杂感栏发表了三篇短评，都是关于时局的言论。如署名真城的《他们为的什么！》一文批评说：“若有人不信中国的内争是各国帝国主义者造成的，他不是疯子，定是瞎子！”署名华中的《日本人与中国的教育家》延续着批判“教育救国”的思路：“教育家自己不要国家也罢了，还要叫我们也学他一样不要国家！”署名法林的《中国人呵！请替祖宗稍留颜面吧》称：“国事弄到这步田地，只要有眼睛的人都知道是外人操纵所致！”该期文艺栏则有胡风的新诗《我从田间来》（署名光人）。胡风1937年出版诗集《野花与箭》时为该诗标注的写作时间是“一九二五年”^[30]，但该期周刊是1924年11月14日出版，因此该诗写作时间不可能在此之后。更重要的是两首诗的内容也有差异。如《附中周刊》上该诗后附有写作地点：“轮船上”。由此可以对这首诗做新的理解，而不是仅仅将该诗做“乡愁式”的阐释。

第38期的言论栏上有署名莹的《读〈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宣言〉》和蕴空的《纷扰之时局与反常之人心》。杂感栏则是署名曙寰的《旁观者清》。文艺栏是一首新诗和一篇白话散文。第39期的言论栏上有署名中华的《列强的第三期联合进攻与中国将来的厄运》和署名问世的《弱小的呼声》。署名中华的文章占据5页半的版面，而该期周刊仅有

8页。笔名“中华”与上一期“华中”和后面的“仲华”应是同一人，因为文中有共同的惯用语。

第40期的言论栏上有署名顷木的《忠告同学》和莹的《“洁身自好”与“假公济私”》。该期书报介绍栏目是关于孙中山的演讲集，作者谓“《民族主义》中已示吾人救国之二大方针，诚为济世之良药”。作者胡絨三系胡风东大附中同学兼蕲春同乡，也是武昌启黄中学的同学。同样，1928年8月，胡风在《瞻望故乡》中否定“国家主义”的民族观念，认为：“何必一定要与以民生为中心的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立异呢？”^[31]该期周刊杂感栏则是署名田正（按：杨超）的《同学听者！》，署名大乔的《又一消息》和仲华的《谢谢外国人底好意》。此外，第41期和第42期的言论栏有王天任的《求学与救国》、署名夔的《如何解决关于自治会的争端——改组》、希青的《□□国民会议》，专件栏目是《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对于时局之宣言》，且新增“研究”栏目。

由此可见，胡风任“总编辑”时《附中周刊》发表了很多“杂感”式的时论，且侧重新文艺。我们只需从《附中周刊》第61期的编辑室声明“本刊近来言论纪事稿件，颇形缺乏”即可对照出特点。在这些笔名里，署名莹者应是胡风。因胡风原名张光莹，后改学名张光人。且“莹”的三篇文章皆发表在周刊首页言论栏，从文风上看也颇似其此时期的文风。

在现存周刊上，署名光人或张光人的佚作有四篇：《一个波峰——托尔斯泰作品研究的导言》（第20期）、《游“灵岩山上”》（第26期）、《是非与利害——论现代青年根本态度之一》和《我从田间来》（第37期）。学界以往只是从胡风自述中得知其青年时期喜读托尔斯泰，但因缺少原始文本支撑，对其究竟如何理解托氏并不知晓。因此，《一个波峰——托尔斯泰作品研究的导言》（两千余字）就显得非常重要。在胡风看来，托尔斯泰“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所求的是一个合理的现实。人生的目的就是善——就是把现实的人生改为更善。要达到善的目的，唯一途径是爱。爱是什么？——理性的活动。理性是人人所共有的，他名之为神”。而“理性的生活才是‘真我’”，因为

“真正的爱是理性的；理性的爱是牺牲的；牺牲是人类幸福的源泉”^[32]。青年胡风对托氏“爱”与“牺牲”的哲学有深刻体悟，这种宗教感所带来的超越性视角对其后来构造诗学理论具有结构性作用。比如1928年与朱企霞等人蛰居庐山时，“古因（按：胡风）所译的《爱芙灵荷柏》，说是从那儿就可以看出爱者灵魂的伟大。我们所有的，是类似宗教信仰的心”^[33]。在日本阅读了各种左翼文论和政论后，胡风也没有完全抛弃托氏对文艺作品中人物需要通过血肉的感去表现的观点，而这之间的中介就是列宁对托尔斯泰两分法式的分析。1937年，胡风认为“战士和诗人原来是一个神底两个化身”，作家是“在生活和艺术中间受难（Passion）”^[34]。抗战初期，胡风总结鲁迅的“圣者心怀”就是“革命之爱在大众”^[35]。所以1942年才会论述“第一义的诗人”与“精神战士”——“抱着为历史真理献身的心愿再接再厉地向前突进的精神战士”^[36]。神或圣者（宗教感或真理）是战士（“牺牲”）与诗人（“爱”）的统一，在文学上归结于对“真的人”（“革命人”）的执着。

作为文学青年，胡风身处的具体环境对其有耳濡目染的作用，《附中周刊》上不少文章提出的概念和表达的思想与胡风也有莫大关系。譬如同为“雄辩员”的王治安在《附中周刊》上发表了《新旧文艺的欣赏和批评》，文章将新旧文艺之间的冲突看成是“文学的战争”，认为许多“少年军人”将白话文看作是“浅近的文字”，但作者表示这浅近里“所包括的思想，却是很深远很广大的”^[37]。文章还直接提到“化合”一词，这是胡风诗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之一。这自然也与胡风等人的教育者有关，如穆济波此时的文章多是表达一种执着于“现代”“现代人生”的教育精神^[38]，且要有“牺牲现实的精神”“自我扩大的精神”，还用古代思想中的“我”（主体）来阐释这种“自我扩大”，以及如何“适应时代生活的精神”^[39]。胡风在穆济波的邀约下，还曾参加其支持下的青年组织“合作社”^[40]，编辑《合作周刊》。该团体曾组织读书会、游行演讲团和辩论会等。如举行关于现实生活的事理与学理的辩论比赛，还组织演讲日活动，邀请少年中国学会的中坚人物来当“通信演讲者”，而在

校演讲者几乎都是少中会成员，故不难想象“合作社”的言论形态。

三 “委员长”：“实际政治”中的觉悟

抗战时期，胡风在一篇自传中回忆“五卅运动”时，称自己“也是当地的奔走在街头和工厂中间的一人”^[41]。在纪念鲁迅逝世五周年的文章里，胡风惊叹于鲁迅在“五卅”群情激奋中的政治觉悟^[42]。而“五卅”所开启的社会运动直接导向了国民革命，胡风个人的历史命运也在这一过程中曲折展开，并带来“诗学”、“交游”与“党派结构”等多重危机。五四新文学所构造的“文学的主体”与政治运动发生了激烈的撞击，“理想主义者时代”由此开端，也因此终结。如果前文所说“雄辩”与“声音”是发生于“象牙塔”内，那么当“实际政治”到来时，“雄辩”与“声音”、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又会发生新的转变，而主体的接受和表达机制也会显露出其特质与危机。

当“五卅运动”席卷到南京时，胡风所在的东大附中迅即成立了“反抗上海外人惨杀华人东大附中后援会”，并发表宣言与通电。在“后援会第一次联席会议议决”所公布的职员名单中，作为“雄辩员”的胡风与王治安两人同时当选为“委员长”：

“反抗上海外人惨杀华人东大附中后援会”职员名单（按：略引）

1. 委员长 王治安 张光人^[43]

前文曾提及，“雄辩”相对于“演说”讲求对话，也是国语训练和表达的利器。这种声音的表达又会理论话语及文体塑造构成潜在影响。胡风理论文章中的论辩气息，与青年时期所接受的训练不无关系。而且这些论题大多是社会内容，这就可以理解，为何“五卅运动”、国民革命一兴起，作为社会内容的关心者会主动退学，脱离“象牙塔”而置身革命中，虽然对“外部的政治”的关心与“求救于艺术”的理想存在着巨大的撕裂感。前研究多是关注“雄辩”“演说”与白话文、国语教学、文化演进等较为“静态”的联系，而较少注意到在革命与政治实践中，演说者与“雄辩员”的身份状态是如何

转换和参与到“唤醒”民众的具体实践上。就胡风而言，与民众直接接触、在实际的宣传鼓动与“唤醒”中的政治经验甚为重要。

作为“委员长”，胡风的职责是“总揽一切会务及召集会议”。1925年巴金与胡风同在东大附中，曾目睹过胡风的“演说”，且在小说《死去的太阳》中以胡风为原型塑造了一个主人公：“方国亮痛哭流涕地报告这几天的工作情况，他竟激动到在讲坛上乱跳，他嘶声地诉说他们如何每天只睡两三小时，辛苦地办事，然而一般人却渐渐消沉起来……”^[44]这段话将胡风处在政治运动的精神状态形象地描写了出来。而“五卅”之前，胡风担任“总编辑”时所刊发的那些情绪激昂的“杂感”，不正是作为“强Energy”导向了政治运动吗？从“雄辩员”到“总编辑”再到“委员长”，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个连续的历史脉络。

除了写作、演说及召集会议之外，胡风还参与了一些组织活动。例如参加市民大会后的游行，次日英人经营的工厂的中国工人就全体罢工。胡风等人则赶赴现场：

大早，我赶到工厂附近的一个旅馆，则学生和工人已经“济济一堂”了。一个机器工人在兴高采烈地发议论，说如果机器工人全部出了厂，外国人马上就会软刺的……^[45]

在胡风的描述中，工人的“兴高采烈”显然过于天真。共青团南京地委的档案记载道：“和记洋行罢工之初，为工头的罢工。当时工人对于工头之信仰甚深，故不能完全抛弃工头。工头罢工之目的：一方为响应学生，一方为敲竹杠主义，即借此向外国人要挟条件，以保私人利益。”^[46]并且，胡风等人所具有的政治热情，在现实经验中并不能完全“落地”：“工头态度甚不可靠，若工人则又视为他人的事，不与自己相干，即罢工也只是学生要他们罢的。”^[47]

同样，在“五卅运动”中处于领导地位的“政治青年”宛希俨（W君），在胡风的笔下却匮乏政治经验：

W君声音已嘶，叫我大声地传达他的意思：——你们工人为救国而罢工，我们学生就是吃糊子当裤子也是要接济你们的！

可是，这“热烈”的话并不能引起那些代表们的注意，就是那位喊“两个一排”的先生（按：萧楚女）也投下了经验者淡淡的一瞥。原来，这“热烈”是不能解决“工头”与“罢工”的“事实”中之矛盾的。^[48]

这“经验者淡淡的一瞥”击穿了胡风虽“热烈”却“幻想”的一面，在胡风的感觉结构中投下深深的影子，以致在国民革命失败后不久，胡风在一首散文诗中使用了相同语汇：“只有‘淡淡的一瞥’之命运。”^[49]

此外，为了“扩大宣传和统一群众的意识”，胡风等人的小团体“合作社”创办了《人权日报》，萧楚女负责编辑与主笔言论，而“经济的责任却完全归M君（按：穆济波）负担”。穆济波后来负担不起时，“只好聚股，被邀的就有国家主义分子（那时他们尚未彰明与革命势力宣战），而国家主义分子却希望人权日报不要严厉地批评他们”。由此萧楚女宣告脱离，且指责穆济波被醒狮派收买。在这一过程中，胡风显然体验到革命话语之“峻急”与组织团体之“分明”，比如对萧楚女的反应，胡风认为“即在同志中，也有嫌其‘过火’”^[50]。

与此同时，胡风还是当时的学生自治会司议院院长：“有一次，同志开会，那时正是风潮紧急的时候，E校的学生会又是N城民众团体的主角，所以我为事务所绊没有到。事后即接到一个严重的警告，说这样玩忽是欺骗团体，欺骗自己，我感到纪律的森严这算是第一次！”在“五卅”时期，在同乡萧楚女“旧草帽、破蒲扇、黑大布褂子”的外表之下，胡风感受到的却是“太多的现代人的精神”，“果敢，锋利，不客气，不宽容，不讲情面，跟着社会进化的途径跑去”，或是“无情、决绝、勇猛地前进，锋利的批评……”^[51]。这些评语用在胡风在文艺论争中的表现无疑也是贴切的。

在与市民的实际接触中，在演说的启蒙过程中，胡风个人的具体经验如何，我们可以从他同学的一份报告中看到其活动方式，从中可以了解文学青年如何看待普通民众，这之间存在着何种隔阂，在启蒙中“自觉”担负“唤醒”责任的青年，其现实感的构造又是如何成为阻碍其对现实的认知的^[52]。

这篇报告作者是吴光田（1907—1927），在东

大附中读书期间与胡风等人一起参加过“合作社”，“五卅运动”时在各处演讲。胡风是后援会的“委员长”，也曾各处宣讲。吴光田说这个报告是“根据实在的情形，没有一点的装饰”：

我们沿途的走着一路看见电杆上，和墙壁上，汽车后面，都贴着唤醒民众起来救国的告白。

我们今天所写的告白上有许多是什么，“反抗强权”“收回租界”“收回领事裁判权，……”他们看了之后莫名其妙，只说吾们学生又在胡闹，但是我们的确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没有知道这次上海的惨剧，（中略）他们不知道“爱国”和“救国”是什么一回事。^[53]

据档案记载，“当沪上惨杀传宁后，六月一日下午，东大附中罢课，二日即有演讲队至下关讲演，为此次运动导火线（附中我们同学有六人）”^[54]。在胡风等人进行演讲的时候，南京民众却以为是来“传教”的，认为“教徒又在胡说他们的神话了”。在经过解释之后，“他们一部份的人似乎都表示一种愤怒的态度”，但作者随即提出了疑问：“他们表示这种态度，是因为听了我们一时的言论引起的，恐怕几小时后所讲的话就要完全忘掉了。”^[55]在同期一篇《敬告麻木不仁的学生》中，作者希望“尽着吾们所有的力量，唤醒一般弱而无智的平民”^[56]。而当时团南京地委给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直接说：“此地同学对工人运动多无经验，故应付甚困难。”^[57]在《南京学生的工人运动》一文中，作者也说以前“南京学生及市民甚至连工人自己，向来是贱视工人阶级的”^[58]。文学青年对自己作为“学生阶级”的认知，对民众的想象，在政治运动中与民众的实际接触，在这里都可以找到话语原型。

结 语

不难发现，《东南大学附中周刊》所呈现出的“色调浓郁”的南京时代在胡风诗学理论生成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雄辩员”、“总编辑”和“委员长”的身份既是事实，亦是一种历史的象征。相对于胡风的文学感，作为社会内容的政治只是作为

“外部的政治”，并没有很深地进入到主体内部，没有被主体内在化而成为政治的自觉。“五卅”后，胡风很快“偏向到能够寄托远思的文学方面”，甚至“开始接触了古典的世界”^[59]。

“五卅”虽然宣告了“五四时代的正式告终”，许多青年开始左倾，“脱离了胡适之而走向了陈独秀”^[60]，但却并没有终结五四新文学在历史与思想脉络中的伏流与显影。当北伐军胜利进军到武汉时，那些住在“古梦沉沉的北京”的“波西米亚式”的文学青年，“越发鄙弃那琐碎无力的文学争论了”^[61]。但这种“热”的外部政治在国民革命的“狂潮”席卷和“败北”之下很快就“冷”了下来，作为文学青年的胡风在“冷”的时代情绪中反而又开始在文学中寻找一种更内在的“热”。

关于南京时代的政治活动，胡风有一段微妙的自述：“大学里的W君和比我低一级的同学Y君（按：杨超）推着我更多地知道了更关切地触到了社会。”^[62]这里的用词“推着”是有意表明了一种被动的状态，这既是因胡风彼时的文学感所限，同时也试图通过事后叙事将“文学者”的形象置于“政治青年”之上——在国民革命退潮期“为了饭碗及头”而深陷“党派结构”中的胡风^[63]，对“实际政治”已然抗拒。1977年在写于狱中的《简述收获》里，胡风总结道：“凭着对革命的盲目浪漫感情跑回南方，在县城感到沉闷又干不下去。这样任意性的行动，说明了在世界观上没有确定生活上的立场和方向，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被从文艺养成的感情所支配和对文艺本身的留恋。”^[64]“实际政治”无法构成对文艺的激荡而造就成熟的政治经验，文学主体自然也缺乏稳定的方向和位置感。胡风后来去日本留学与寻路，实乃有“方向转换”和“诗学再造”的生命体验。因此，经过三年多“日本体验”后，“空降”到了左联领导层，建立了新的人事交游圈，掌握了理论的武器，已经找到并发现了“求救于艺术”这条“希望最大的路”^[65]。“外部的政治”开始真正褪色，从“文学的内面”去启发根本的政治，逐渐成为胡风后来的核心追求，包括不断通过“唤醒青年”寻找文学共同体，由此在抗战时期形成了左翼诗学理论及其实践的独特的历史脉络。

[1][8][11][24][25][65]《胡风致朱企霞书信选》，《史料与阐释（总第4期）》，第218页，第221页，第218页，第192页，第171页，第212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2][7][20][23][59][62]胡风：《理想主义者时代的回忆》，《我与文学》，郑振铎、傅东华编，第257页，第262页，第260页，第263页，第263页，第262页，上海生活书店1934年版。

[3]参见拙作《“理想主义者时代”的新剪影——青年胡风若干史实考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1期。

[4]梅志称可能因为1923年东大图书馆一场大火，所以该刊物找不到了。笔者查阅到幸存的部分原刊。参见梅志：《胡风传》，第123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5]《停顿三四月的本校周刊》，《东南大学附中周刊》第57期。

[6]如《太戈尔的演讲》，徐志摩口译，王治安笔记，《东南大学附中周刊》第27期。

[9]胡适：《中学国文的教授》，《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

[10]鲁迅：《无声的中国》，《中央日报》副刊，1927年3月23日。

[12]胡风主编的《希望》扉页对罗丹雕塑《思想者》的文字说明，《希望》第2集第1期。

[13]如1925年“苏第七次演说竞进会昨日预赛”，《申报》第11版，1925年5月24日。

[14]春：《雄辩健将初试舌锋》，《东南大学附中周刊》第25期。

[15]《全体教职员重开临时会议》，《东南大学附中周刊》第48期。

[16]参见《本校代表赴松参与演说比赛始末记》，《东南大学附中周刊》第75期。

[17]张光人：《是非与利害——论现代青年根本态度之一》，《东南大学附中周刊》第29期。

[18][45][48][50][51]光人：《五卅纪念中忆萧楚女》，《中央日报》副刊，1927年5月29日。胡风与杨效春、穆济波等交往较多。

[19][21][27]光人：《现在的青年何以不喜欢团结——答刘巍君》，《申报·教育与人生》周刊第34期，1924年。

[22]穆木天：《郭沫若的诗歌》，《文学》第8卷第1期，

1937年。

[26] 穆济波主编：《高级国语读本·教材支配表》卷一，中华书局1925年版。

[28] 穆济波：《中学校国文教学问题》，《中等教育》第2卷第5期，1924年。

[29] 《本刊启事》，《东南大学附中周刊》第21期。为行文简洁，除非特别需要，后文注释不再单独标注《东南大学附中周刊》。

[30] 胡风：《野花与箭》，第13页，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版。

[31] 张光人：《瞻望故乡》，《京报副刊》第232期，1925年。

[32] 光人：《一个波峰：托尔斯泰作品研究的导言》，《东南大学附中周刊》第20期。

[33] 素川（朱企霞）：《有这样的恋爱》（后记），《策进周刊》第2卷第44期，1928年。

[34] 胡风：《略论文学无门》，《中流》第2卷第3期，1937年。

[35] 胡风：《断章》，《七月》第4集第3期，1939年。

[36] 胡风：《涉及诗学的若干问题》，《诗创作》第15期，1942年。

[37] 王治安：《新旧文艺的欣赏和批评》，《东南大学附中周刊》第22期。

[38] 参见穆济波：《教育家的新觉悟——两种压迫下痛苦的人生的叫喊》，《东南大学附中周刊》（“军国民训练特刊”）第46期。

[39] 穆济波：《教育家所必要的三种精神和一种觉悟》，《中等教育》第2卷第4期，1924年。

[40] 穆济波：《介绍一个新组织的青年团体》，《学生杂志》第11卷第2期，1924年。

[41] 胡风：《为一个外国刊物写的自传》，《野草》第2卷第5、6合期，1941年。

[42] 参见胡风：《如果现在他还活着——纪念鲁迅先生

逝世五周年》，《大众生活》，1941年第23期。

[43] 《反抗上海外人惨杀华人大附中后援会组织大纲》，《东南大学附中周刊》第53期。

[44] 巴金：《怀念胡风》，《文汇月刊》1986年第10期。

[46] 《宁隶书关于下关和记洋行罢工报告》，《江苏革命史料选辑》第2辑，第13页，江苏省档案局1981年版。

[47] [54] [57] 《宁隶书关于英商和记洋行罢工运动给钟兄的报告》，《江苏革命史料选辑》第2辑，第11页，第10页，第12页。

[49] 古因：《我彳亍在空虚里》，江西《民国日报》副刊《野火》，1928年2月5日。

[52] 参见贺照田：《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读书》2016年第2期。

[53] [55] 吴光田：《到下关去演讲的经过》，《东南大学附中周刊》第53期。

[56] 唐明善：《敬告麻木不仁的学生》，《东南大学附中周刊》第53期。同期《后援会进行概括》中甚至用“罚款”的方式保证“游行”：“每次游行，及全体集会，全校教职员同学，应一律出席，如无故缺席，则罚洋五元，且公布缺席者姓名……每日下午七时，各部职员须至办公室办公，无故不到者，罚洋一元。”

[58] 嘉树：《南京学生的工人运动》，《中国青年》第5卷第104期，1926年。

[60] [61]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第10页，第22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

[63] 企霞：《过去的革命两时代及与之有关的一时代》，《北新》第3卷第5期，1929年。

[64] 胡风：《简述收获》，《胡风全集》第6卷，第614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作者单位：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何吉贤